

反思欧洲认同：历史、现状与未来

埃德加·莫兰 雅克·德洛尔 阿尔弗雷德·贝纳—维加

编者按：“欧洲认同”是一体化进程中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近年来在欧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期我们特约了三篇法国人士撰写的短文，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埃德加·莫兰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他的文章以“地中海神话”概念为切入点，用大历史的眼光，从欧洲文明变迁的角度对欧洲“树立起共同的认同感”的问题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雅克·德洛尔是前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章分析了欧洲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观念性挑战，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对欧洲认同问题进行了讨论。贝纳—维加则是一个从事实证社会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曾经以法国特定地区为样本，对青年人的欧洲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的文章以田野资料为基础，讨论了法国青年的“欧洲意识”问题。青年是欧洲的未来，他们的欧洲意识也就预示着欧洲认同的未来。由于这三篇文章恰好分别侧重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角度对欧洲认同问题进行了讨论，所以我们以“反思欧洲认同”为题将它们组织在一起，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框架，比较全面地了解欧洲人对于“认同问题”的看法。

一 欧洲认同：地中海神话的破除与再造（埃德加·莫兰）

在历史上，地中海是个充满对抗和冲突之地，也是个兼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地方。它自古以来就是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相互混合的场所。再造地中海神话并不仅仅意味着选取它的正面因素，还在于发掘各种文明的根源，揭示出那些在历史上遭到阻断或排斥的潜力并使其获得新生，从而让地中海真正成为我们

的母亲海。

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角度看,地中海是个十分古老的地区。然而,地中海的名称,即“被陆地包围的一组海域”却是不久以前才有的。在古代,从安纳托利亚到直布罗陀的海域被划分为若干个海洋。诚然,当这片海域成为罗马帝国的中心时,它便被统一起来并被称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但是真到18世纪,人们才将其称为地中海。这个名称来源于陆地文明,尤其是与其他大陆相连的陆地文明。那时,地中海被人们视为处于非洲、亚洲等“大陆之间的海洋”。当“地中海”的称谓被约定俗成后,它在南欧人乃至北欧人的心目中自然也成为一种无可质疑的地理和战略现实,并进而成为一种政治现实、一种富有诗意和神话色彩的现实。之所以富有诗意,是由于明媚的阳光和蓝色的大海构成了地中海特有的风光,即使到了冬季,这一风光也依然优美。所有这些都成为地中海的骄傲,当然也激起了北方居民的向往和怀念之情。对地处寒冷区域的日耳曼世界而言,地中海无疑是个梦中之乡。地中海还是让人产生愉悦感的话题,法语中将它称为“橙花盛开的地方”。另外,地中海还被制造成一种神话。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陶醉和简化性质的神话:为了塑造地中海的希腊拉丁形象,所有不光彩的东西都被排除在外,被保留下来的品质只有和谐、交流和文明源泉。而在这种观念中,文明是一种福地,它的本质则是希腊和拉丁文化。然而,只要一提到古希腊、罗马就要联想到和谐与繁荣,这必然会使我们把残酷的战争抛在脑后。但是,这种战争的确曾经发生过。首先是罗马对希腊实施的可怕征服,然后还有罗马人对迦太基进行的同样令人生畏的征服和摧毁。可是,人们却似乎忘记了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发生过的这些事情。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便会发现,地中海曾是个充满对抗和冲突之地,它曾有过惊人的创造,但同样也摧毁过许多文明。在这片地区,不仅出现过航海家之间的竞争,也发生过商业城邦之间的争端,以及不同思想和宗教间的冲突。而这种争端和冲突的性质甚至是异常尖锐的。地中海地区曾出现过种类繁多的多神论,例如埃及古老文明的多神论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多神论。然而,地中海同样也是个一神论占主导的地方。一神论后来发展为三大支系。这三种一神论虽同出一源,但并未能使它们相互谅解与合作,而是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冲突。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

众所周知,地中海是个产生神话的地方。这里曾明确出现过理性与合理性,但又始终充斥着疯狂与妄想。而且,怀疑主义也是在这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同样,最极端的宗教信仰也是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智人以及兼有智人和痴人两种性质的人类的所有行为,都集中显现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而且,地中海还是个以混合著称的地区,但这也造成了不同寻常的混乱。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是由不同种族、宗教、习俗和文明混合在一起的奇特地区,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人们便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似乎都是混乱,而上面谈到的和谐、奇迹和智慧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这种混乱是复杂性的表现。在这里,复杂性一词是指由若干极为不同和异质的因素合成的整体。它们之所以合为一体,恰恰是由于对立会将相互冲突的双方联系起来。这种混乱既有破坏性,也有创造性。它使我想起了赫拉克利特的话:“把分裂因素与和谐因素统一起来。实际上,地中海是个和谐与分裂并存的地区,更是一片肥沃、多产的土地:它盛产多样性。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文明的方式,也可以把冲突纳入民主思想。因为归根结蒂,民主制度的活力只能源于对立思想之间的相互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并在某种规则下进行。这些民主规则可以使冲突不会变得过于激烈和野蛮。”

在地中海地区,思想上的冲突不会导致对话者之间实施肉体清除。在雅典,哲学和民主几乎是同时建立起来。而且,我们在地中海还看到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即战败者对战胜者实施文明教化。一则著名的格言讲道:战败的希腊无情地战胜了战胜者。罗马帝国在摧毁希腊时把科林斯洗劫一空,但却用辐重车载回了一些希腊思想家和希腊书籍。于是,几个世纪后,整个罗马帝国都讲希腊语了,罗马的艺术和思想也全部渗透了希腊的影响。显然,只有战败者没有被灭绝才能对征服者实施文明教化。但是,在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却遭到了彻底毁灭。我们不应忘记所有这些毁坏。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和排除那种具有简化和陶醉性质的地中海神话。

然而,你们也许会问:破除地中海神话似乎很有必要,但为何还要再造地中海神话呢?首先,再造神话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意味着我们在构思地中海时,要重新赋予它某种重大的情感价值,某种近乎神圣的价值。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筛选出地中海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它最有价值的东西呢?首先是普遍性。普遍性的观念是在地中海地区产生的。这些观念最早出现于古埃及,表现为对太阳神和法老王亚克那顿的崇拜。这种崇拜活动把诸神赶出了埃及的神庙。当然,太阳神后来也被教士们扫地出门了。另外,在亚伯拉罕的启示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潜在的普遍性;保罗的书信对此也有十分明确的阐述。

保罗认为:不应再有犹太人、非犹太人和希腊人之分,他们都是一样的。这表明,在保罗的思想、伊斯兰预言和穆罕默德预言中,普遍主义同样存在。显然,你们完全清楚,这种普遍主义并未能阻止上述各种宗教变得极端唯我独尊,并使它们认为唯有自己才享有真理的启示,还导致了历史上所有的宗教战争。然而,在多神论和多神崇拜为主导的时期,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战争。当然,你们在希腊哲学中,在后来的罗马法中,以及在民主制的原则中也能找到普遍主义。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这种普遍主义借助人文主义获得了再生。因此,上述的普遍性观念在地中海源远流长,尽管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但仍不失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观念。

地中海另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当属人员之间的接触、交流和杂交。我甚至认为,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至今仍显得十分重要和有益。无论对地中海南部还是对其北部而言,人口流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认为,再造地中海神话并不仅仅意味着筛选出它的正面因素,我们还需要寻找和发现是何种天性使地中海孕育出如此多样性的文明、文化和思想。

在地中海,通过文化间的所有接触,必然会形成某种共同属性。为解释共同属性一词,我要打个比方。生物学家们不久前发现,我们身体的组织中含有某种被称作“干细胞”的东西。何为干细胞呢?干细胞就是所有动物和人类身上的胚胎细胞,也被称作全潜能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具有无穷的创造能力,因为它们的功能没有被专门化。研究这些干细胞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胚胎克隆就旨在利用干细胞,使染病心脏、受损肝脏的组织得以再生。在我们身上,包括在大脑和骨髓中都有干细胞存在。但根据最新发现,这些干细胞似乎失去了活性,或至少需要被重新激活。于是,我认为在地中海的人文主义中也存在着一些干细胞,即能够促进文明生长的干细胞。

但是,当一种文明变得僵化时,或一种信仰成为教条时,它们自然会失去生命和活力。从根本上讲,地中海的复归和再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恢复地中海的孕育和造就机能,找回各种文明中被阻断或排斥的潜力,进而实现保罗·瓦莱里对地中海的美誉:“一台制造文明的机器”。

一旦我们相信有可能恢复地中海的孕育和再生机能,我们显然便开始了对地中海神话的再造。但是,神话是一种主导性理念,它具有十分强大和近乎神秘的情感力量。这一神话的再造必然会与关于海洋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即使这仅仅是由于海洋是生命的发源地。我们知道,生命的产生和成长,最初单细胞活体

的形成,即便不是在海洋也是在水中进行的。我们的血液不仍然带有很咸的味道吗?这表明我们仍保留着这一渊源的某些痕迹。在我们的神话中,关于海洋和母亲、母性和大海的观念之间有着十分深刻和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一种孕育和母性的本质赋予了地中海。而且,这片海洋既特别开放又十分封闭:与浩瀚无边的大洋不同,其地质学命运决定了它的封闭性。

这片海域的规模与人类的能力恰好相当。它使我们能够与邻邦交往,无论他们是敌人还是朋友。我们真应当带着深厚的感情重新体验一下这片海洋。没有母子关系就不会有兄弟亲情。我们在潜意识中深知这一点,因为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我们对“祖国”(patrie)怀有某种强烈的情感。“祖国”一词同时带有母亲和父亲的性质,是个雌雄同体字。它的前半部分是阳性名词“pater”,即父亲,其后半部分是阴性名词“mater”。而且,我们经常会说“祖国母亲”,这就是用爱意将祖国母亲化了,正如我们也会用必须尊重和服从的权威把祖国父亲化一样。

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头一句唱道:“起来,祖国的孩子们!”其中表达的思想促使我们像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有可能借助地中海的母亲本质来促进相互友好。我们还可以从地中海找到欢乐的源泉,因为地中海把阳光和蔚蓝色紧密结合起来。尽管我们经历过无数的痛苦和灾难,但我们始终会以自己是地中海人而感到喜悦。

如果我们从心底里怀有地中海是母亲海的观念,我们便会自然地产生保护和拯救它的愿望。这也将直接促使我们关注地中海的生态环境。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这片海洋已经成为众多污染的牺牲品,其生存本身也面临着威胁。对我们而言,要使地中海表现出母性,就要削弱国界的作用,努力实现谅解与协作,树立起共同的认同感。与那些助长偏执和教条思想的神话不同,地中海的神话将有助于促进团结统一。如同我上面所讲的,如果我们要从地中海观念中选出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地中海能使我们化腐朽为神奇。(马胜利译)

二 欧洲建设中的欧洲认同问题(雅克·德洛尔)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没有专门思考过“认同”问题,不能确定认同在哪些方面能对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起作用。“认同”的概念也不好定义,可能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对某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团体或共同体的“归属感”,他人在认

同和欧盟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间建立的联系、政治学关于“属于”或“不属于”某个团体的传统区分,等等。我首先梳理几个概念,指出欧洲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对立。在过去的50年间,欧洲和民族国家之间是一种辩证与冲突的关系。今天,在谈到扩大和全球化时,“民族”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其次,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欧洲一体化进程在1985-1995年间的加速发展,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其中还有制度和经济因素。最后我想谈谈目前正在热议的欧洲社会计划。

关于欧洲和民族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想引用下面两段著名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经说:“欧洲如果没有历史,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孤儿。我们的欧洲位于大西洋、亚洲和非洲之间,既是地理位置造就的,也是历史造就的,它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希腊人发明‘欧洲’这个名字起,一直持续至今”。这段话向我们传达了某种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思潮与心态。

另一方面,我可以借用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的说法,他指出,虽然成员国正在逐步趋同,但是政治统一仍然没有实现。不过我更倾向于引用政治学家多米尼克·施纳普(Dominique Schnapper)的话:“现代民族的现实乃至观念是在欧洲诞生的,随后才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在欧洲,民族才扎根于遥远的过去。而且,这段漫长的历史充斥着对立和战争,它们是确保每个民族的个性与身份,以及个体效忠团体的理想方式”。

由此产生了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常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的争论。这为我们理解欧洲一体化的演变或者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的姿态与行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过去的50年间,“民族”一直受到质疑:一定不要忘记,始于二战之前的联邦运动将民族等同于民族主义。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联邦运动似乎认为(也许是无意识地)民族终究是会消失的,我自己从不这么认为。但是,欧洲整个历史都充斥着对“民族”的精神谴责,认为“民族”是“民族主义的罪魁祸首”,最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地区”或者“地区共同体”的观念,也对“民族”构成了挑战。这类的争论还在继续,比如在比利时和西班牙。以西班牙为例,棘手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问题就与此不无关系。

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我发现,欧洲一体化遇到的挫折和危机致使某些人指责欧洲建设具有反民主特性。但是,欧洲建设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它只是揭示了问题,问题来自于民众对民主感到失望的时代里的政治演进状况。法国的公

投,或者其它更多的时候,把对民主合法性的诘问聚焦到欧洲一体化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实际上,该反思的是我们的民族内部的民主运作状况。我们不能要求目前的欧洲建设解决那些属于民族范畴的问题。

事实是,当代学术争论又把“民族”复活了。所谓“复活”,不是说有些学者认为欧洲建设应该停止,而是说,他们或把欧洲视作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形式,或视作通过依靠主权让渡实现一体化的工具。论争是由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和当代个人主义的挑战引起的。追根溯源,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是如何组成的?有一种右翼思想对个人主义和福利国家都持批判态度,比如迪法比奥(Udo di Fabio)和他的《自由的文化》(Die Kultur der Freiheit),要求返回到他所认为的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家庭、宗教和民族。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消失:这正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的区别所在。这和征服了咱们的政府首脑、坚持主张建设尽可能透明和有效的市场经济、市场是最好的仲裁者的野蛮自由主义无关,而是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仍然要起一定的作用,虽然它应该弱化在福利国家舞台上的作用。这种新保守主义强调家庭和集体责任,在我看来,面对欧洲建设的一蹶不振和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不应当忽视它。反过来,另一位德国学者艾普勒(Erhard Eppeler)在《残留的国家》(L'Etat fin de siècle)一书中则表达了对国家责任不断私有化的担心。这类左翼观点重在思考现代福利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

因此,我们看到,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潮考虑的更多的是“民族的”、“国家的”而非“欧洲”的问题——即便艾普勒是在有关权限让渡的政治一体化框架内讨论问题的。我认为,任何有关认同问题的学术研究都应该考虑这些方面。虽然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德国学者的,但是类似的思考随处可见。最近出版的一本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牵头的集体著作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自我批判式的考察,特别是在“机会平等”和“国家的作用”方面。因此,现行的政治思考也更多地集中于“民族的”未来与“民族的”现代化,而非“欧洲”问题。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争论的核心始终停留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福利国家问题,另一方面是当代个人主义问题。

接下来我想指出,欧洲建设的复兴不单是“功能的”和“经济的”。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对让·莫内而言,“运动就是一切”,只要“动着”就行,终极目标倒成了其次的。这种对功能主义及其后的专家治国论的批判今天被某些人再度提起。以这种观点来看待欧洲建设的所有努力,是片面和错误的。原因如下:首

先,认同同时也指团体的“幸存”。别忘了欧洲的“衰败”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我自己也经常提及,甚至在1985年的就职演说中就已经提到了。目前这个论题依然无所不在。“里斯本战略”的背后,也是对“衰败”与“幸存”的思考。当向欧洲人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就超越了功能主义。其次,《单一欧洲法令》的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团结”有着丰富的含义,其中包含着“追求某种身份的萌芽。从这个角度来看,“团结”显然既指内部团结也指外部团结。因此,在我看来,结构政策的实施方式就包含有“认同”的因素。但是假如把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结构政策变成某种旨在救济穷国的“财政补贴俱乐部”,那就和“认同”的道路渐行渐远了。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层面的“社会对话”。在法国,它被人们彻底遗忘了。法国人以缺乏“社会欧洲”为借口向《欧盟宪法条约》草案说了“不”。在社会对话之初,社会伙伴的头脑很清醒,他们指出“对话”本身才是关键,这不是一个功能主义的话题。从由大市场的建立所代表的共同根基出发,所有这些因素,即使不能真正形成社会,至少也构建了联系。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推出了“欧洲之魂”计划,但它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理解。计划的宗旨不仅仅是在各种宗教之间展开对话,虽然这么做是有益的:我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一位法国主教曾说,欧洲建设完全停留在物质层面。这让我大为光火。“欧洲之魂”是一条超越内部市场、结构政策或共同农业政策的道路,而不是宗教观念的欧洲!不信仰上帝也可以有灵魂。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过分地批判让·莫内的所谓功能主义。当然我们使用了功能主义和溢出效应,但是我们也赋予了它血肉。在和撒切尔夫人辩论时我曾提醒她,“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三点:权力共同体、主权的共同行使,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联邦因素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可以就联邦主义讨论三天三夜,但事实上联邦式的决策和政策实施方式确实已经是共同体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不仅仅是新威斯特伐利亚式合作方式的反映。

最后我谈谈欧洲认同和欧洲社会计划,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指出我们的共同点与分歧。我们的共同之处是民主、个人主义和社会之间一定的平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人号召对此进行改革)。除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危机上的分歧外,我们的主要分歧在于社会模式的多样化和国家作用的差异性。谋求社会领域的欧洲建设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障碍,不仅体现在某些国家所要求的辅助性原则上,而且在于各个社会的不同风俗习惯。另外一个分裂

因素是欧洲层面上的融合程度。在今天的“联盟”中(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共同体),某些人要求把商业和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竞争拓展为国家间的竞争。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那么欧洲一体化观念本身都会解体。我们的最后一个分歧是:对欧盟附加值的性质与品质的不同理解。

我们必须牢记所有这些分歧,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有关欧洲的辩论。为了更好地理解欧洲认同的困惑,我们需要谨记,欧洲不是自发建成的——欧洲建设的积极分子总是忘记这点——,而是来自历史的挑战。这可以用以下四点来说明:你可以凭借个人的欧洲建设计划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分子,但是每当面临新挑战时,你就会说:“这不是我的欧洲观,我拒绝接受”;或反之:“欧洲应该以顺应历史挑战的方式来建设”。就欧洲认同而言,我们曾经遇到过三大挑战,第四大挑战也正在逼近。第一大挑战是,是否接受英国加入。当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认为英国加入后会完全接受六创始国的观点和制度安排。然而最后我们还是接纳了英国,理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把它吸纳进来总比将其排斥在外要好;第二大挑战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三大“新民主”国家的加入问题:在当时的法国和意大利,人们热烈地争论是否应该接纳这三个经济发展水平比他们低得多的国家。最后宽宏大量的欧洲人做出了欢迎的姿态,同时帮助三国尽快融入民主国家共同体。三国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盟的接纳。第三大挑战是中东欧国家的加入问题,这一点我们对公众解释得非常不够,但是中东欧人民是和我们一样的欧洲人。这些国家没有在时机最成熟的1990或1991年加入进来,原因是我们没有向它们发出足够的政治信号,比如说:“你们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分子,欢迎你们,这是历史的荣耀,一体化和适应欧盟规则等问题,我们随后再讨论”。我们没有做出类似的表示,而是让它们和专家技术论者在诸如香蕉的大小、圆珠笔的尺寸等技术细节上纠缠不休。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受到了所有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主要机构的影响,而不是我们的欧洲精神,部分责任在我们。而最后一轮扩大既未受到认可,也未得到理解,围绕欧盟宪法条约展开的激烈争论表明了这一点。

土耳其的加入问题是第四大也是更为敏感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来吧,谈判可以……,但是,仅此而已!在某些人看来,我们所遇到的,不是某个美国作者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仍然是某些团体对他者的拒绝和抵制。面对这个问题,假如当初欧洲人说了“不”,这意味着人们潜意识里认同同样的逻辑,即拒绝他人、拒绝努力互相理解。好在我们说了“是”。但是这里,我想再次

重申一个重要问题:与最初积极而有力地回应当时所面临的历史挑战相比,欧洲确实丧失了个性吗?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或许2020或2025年的史学家将写道:“欧洲做了它应该做的,调整自己并对全球化进行了适当的规制。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在要求大家面对认同问题的同时,无视欧洲正面临的上述挑战。”

我知道,我并没有解决认同这个痛苦的问题,但是我至少强调了一点,即欧洲建设的成就来自于不断克服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这就是整个欧洲建设的发展历程。(彭姝祚译)

三 法国青年的欧洲意识(阿尔弗雷德·贝纳—维加)

(一)欧洲面临危机、进入反思时代。今天,很多人认为,欧洲建设的成功来自人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欧洲人共同享有的、多样化的认同——这是实现真正的欧洲公民权的基础。然而“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中充满着迟疑、犹豫以及后退的企图,最近法国、荷兰两国对《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的否决就表明了这一点。在很多欧洲人看来,欧洲是个令人疑虑和不安的主题,欧洲公民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人若要感觉自己是欧洲公民,首先需要感觉自己属于国家、市镇等更小的地理单位。

在某些人看来,欧洲不过是一个经济大市场,对民族的生产和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威胁;在另一些人看来,欧洲就是一个官僚机构,在遥远的布鲁塞尔发号施令。这些在民族政治斗争和博弈中经常用到的陈腔旧调,为欧洲勾勒了一副远离民众的形象。这些成见有意将地方、地区或者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对立起来。

欧洲正处于历史危机的关头。经过几年的扩大及随后短暂的机构改革,目前欧洲处于“停滞”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特别是欧洲观念,既受到怀疑,又面临深刻的机构、决策合法性、公民与其代表间的对话等各方面的信任危机。哈贝马斯曾说过,目前的政治问题不是因为人们对欧洲缺乏热情,而是缺乏相互信任。面对这种状况和欧洲可能陷入瘫痪的危险,欧盟当局应该恢复社会对话,以消除疑虑、重建信任。我们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

在这种背景下,直面怀疑的方式之一是考察青年人对欧洲未来的看法:他们怎样理解欧洲公民权问题?怎样定义欧洲公民权?与传统的依靠制度和法律来

建设欧洲的方式相比,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方式?是否把欧洲视作“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蓝图”?如何把“欧洲事业”当作自身的使命?欧洲“蓝图”如何超越他们的归属、生活经验和身份认同,直至出现欧洲意识?就这些问题,我们在法国普瓦图—夏朗特大区的高中生中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每个年轻人都表达了对欧洲未来的带有疑虑的期望,调查结果对我们深有启发。

(二)青年人的欧洲意识和欧洲观念。欧洲意识是何时以及如何出现的?换言之,欧洲意识是否存在?青年人认为作为公民权基础的欧洲意识并不存在,由于缺乏这种意识,“我们无法想象自己是欧洲公民,甚至缺乏成为欧洲公民的主观意愿”。另一位青年人的回答也颇为耐人寻味:“我的心想说‘是’,但是我的头脑对我说‘不’”。调查还表明,青年人没有明确阐述什么是“欧洲观念”,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因为这能使我们对青年人的欧洲意识做出一些判断。在我们看来,欧洲观念是一种假设,它的定义来自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可用知识传承加以检验的理性,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我们既要考虑精神层面的东西,也要考虑“实用”原则,后者更能使青年人受益,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感受欧洲的机会,比如旅游、人员流动(无论是学生交流、还是在企业实习)等都是通过日常生活发掘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生活方式多样性以及生存多样性的机会,可以激发青年人的命运和计划共同体感。出身不同、国籍不同的青年人通过这类体验可使欧洲空间变得熟悉和贴近,萌发归属感和命运共同体感,有助于唤醒他们的欧洲意识。

在调查的过程中,青年人提了几点建议:首先,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探索”和“体验”来了解欧洲,比如借助旅行认识一个欧洲地区;通过参观实习了解欧盟机构的运作,等等;第二,建议将欧洲作为知识传授的重点,进一步拓展面对青年人的教学和文化计划,让青年人掌握更多有关欧洲的知识;第三:建议把对欧洲的思考拓展到学校以外,比如有一组青年人就在朋友圈里讨论欧洲的各种现实问题:“我们每个礼拜聚会一次,谈论欧洲问题。我们事先选好题目,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搜集资料、作准备,发言的时候就不会空谈”。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因为欧洲的未来是年轻人的未来,欧洲在社会、政治等领域面临的挑战对年轻人来说十分关键;另一方面,对中学生而言,工具式的教育难以达到造就欧洲公民的目的,比如一个年轻人说:“公民、司法和社会教育什么也没教会我们。”

而且, 18岁以下的年轻人感觉自己游离在政治辩论之外。譬如他们说: “我们还没有成年, 没有选举权, 因此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知情权……”。所以, 类似的鲜活讨论就很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类倡议是年轻人对他们所看到的双重挑战——缺乏对“欧洲现象”的讨论和相关信息不足——的回应: 他们试图通过具体、有效和恰当的行动参与到欧洲计划中来。对“欧洲现象”的政治体验表现了年轻人对“欧洲事业”的热心, 它提醒我们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帮助他们参与欧洲政治辩论。

(三) 青年人眼中的欧洲。普瓦图—夏朗特大区的中学生渴望对“欧洲事业”进行批评式的参与。调查表明, 他们对欧洲的现状感到一定程度的厌倦、不满和失望, 但另一方面依然持乐观态度; 他们对欧洲问题普遍非常敏感。应该说, 自马约以来, 公民对布鲁塞尔发生的一切比以往知道得更多, 正如魏尔纳·穆勒 (Jan-Werner Müller) 所说: “我们不能再把欧洲藏起来了”。我们原以为欧洲青年公民认为欧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普瓦图—夏朗特大区的中学生对此持不确定甚至批评态度。

(1) 欧洲经济。年轻人认为“欧洲只是赚钱的工具”, 经济逻辑主导一切, 缺乏政治计划。其实, “经济”在欧洲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暴露的是欧洲治理的角度问题。对政治领袖而言, 优先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竞争力、效率和生产率, 从而增加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在他们看来, 欧洲的问题是面对残酷的经济竞争, 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模式, 从而既保证充分就业, 又保证社会保障。但是年轻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对经济的运作方式和结果都更多地持批评态度, 认为欧洲政治当局难以确定一种发展模式, 欧洲人各行其是, 不懂得达成一致; 英国人不采纳欧元, 有的国家不加入申根空间。他们的疑问是, 欧洲 (在经济上) 强大的理由能否被今天的公民所接受? 当然, 对经济欧洲, 青年人也有一些正面看法, 比如对欧元的积极评价。

(2) 欧洲政治。对有关欧洲政治的调查表明, 青年人特别关注下列几方面: 第一是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年轻人认为,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紧张局势, 欧洲几乎“无所作为”或者“发生了分裂”; 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让世人听到它的声音; 在武装冲突、人权及其他问题上争来吵去、持不同立场。为此, 他们建议成员

See Jan-Werner Müller, 《Fin de la constitution, fin du patriotisme constitutionnel》, *Esprit*, 2006, p. 15.
参见: 《Le futur de l'Europe》, *Eurobaromètre spécial* 251, mais 206.

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之间应该保持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借助“霸权”,也就是说敦促所有人遵守一样的原则,从而实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政治欧洲。第二是欧洲议会。青年人认为,欧洲议会本应在制定决策并使其在所有成员国得到切实贯彻方面发挥主动作用,但它没有做到。他们建议,(1)议会通过媒介对决策加以说明;(2)大量增加议会的工作。第三,他们认为欧洲缺乏规划和计划,几种政治观互相碰撞:有人主张以经济为主,譬如英国,它持一种“泛欧洲”的政治观,希望“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空间,即一个没有障碍的大市场”;有人主张以政治为主,希望将欧洲建设成堪与美国媲美的政治力量;还有人强调文化和文明。无论欧洲选择走哪条道路,在年轻人看来都不是万能的,因此他们建议欧洲进行深刻的机构改革和政治改造。最后,他们还认为欧洲缺乏一位总统。

(四)结论。调查表明,对年轻人而言,只有立足现在并面向未来,欧洲意识才能诞生,而不是一头扎入过去,在故纸堆里寻找有关统一或者明确的欧洲认同的神话。在当今,多重认同现象越来越正常,青年人拥有多重归属感,有时候一种归属意识胜过另一种。因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重建一种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欧洲观念。那么如何描述这种欧洲观念呢?首先,我们发现已经有一部分人青年人具有了“共同蓝图”意识,但是还摇摆不定;其次,应该使这种意识深深扎根于青年人的思想、感情乃至存在之中。“永远都不要任由意识做主;在特定且不可预料的时刻,永远都是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和意识之光共同起决定作用。”最后,我想借用埃德加·莫兰就欧洲观念所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为结束:“我们处在尚不能确定的(欧洲观念)的孕育期”。我们认为,莫兰所说的“孕育”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准备:(1)归属意识;(2)自反意识(批评式的自我表达);(3)积极的自我意识(表现为积极介入)。我们可将之视作欧洲观念的三根支柱。(彭姝祎编译)

(作者简介:埃德加·莫兰,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雅克·德洛尔,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阿尔弗雷德·贝纳-维加,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责任编辑:田德文)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6 No. 1 February 2008

ARTICLES

- 1 Passé présent et avenir, réflexions sur l'identité européenne
E. Morin, J. Debrs et A. Pena-Vega
Avec l'approfondissement de l'intégration de l'Europe, le problème de l'identité européenne devient un problème important et suscite de vastes débats en Europe. Nous publions ici trois textes des personnalités françaises qui nous présentent, à partir des angles de vue différents, leurs analyses et réflexions sur ce problème. Dans son article *Démythifier et remythifier la Méditerranée*, Edgar Morin, grand penseur contemporain a présenté à partir du "Mythe de la Méditerranée" sa vision historique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ainsi que sa réflexion philosophique sur la formation de l'identité européenne. Jacques Delors, ex-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joué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e processus de l'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Dans son intervention au séminaire *La Question de l'identité européenne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Union* (le 24 novembre 2005), il a analysé les défis conceptuels que rencontre l'Europe dans sa construction et les réalités politiques concernant les problèmes de l'identité. Alfredo Pena-Vega est chercheur titulaire du Centre d'Etudes transdisciplinaires, Sociologie, Anthropologie, Histoire (EHESS / CNRS). Reposant sur une conception plurielle, dynamique et complexe, il a fait, avec ses collègues une recherche exploratoire dans la région Poitou-Charentes sur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des jeunes. L'avenir de l'Europe réside dans la jeunesse, l'identité européenne dépendra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des jeunes, voilà la signification de cette recherche.
- 14 The Idea of Europe in Transformation: 1492 - 1992
KUANG Yang
In the long run of the European history, the idea of Europe displays itself mainly in three forms of discourses: "the idea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identity", which find their expressions in a variety of concrete contents, illustrating the dynamic variabilities of the idea of Europe grown out of the context of the socio-cultural changes, the geopolitics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part on the idea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reveals the Europeans'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self-other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views on civilization. The one on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demonstrates briefly the scenarios for European unific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part on the idea of European identity gives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ies by three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holars, that is, Edgar Morin, Anthony D. Smith and Jürgen Habermas.